

整个中国

赵蘅再现翻译巨擘杨宪益的最后十年

半生漂泊:居住史就是一部漂泊史

据赵蘅回忆,在舅舅一家人曾经居住过的那套幽静的四合院里,经常会听到舅母从东厢房中发出“嗒嗒嗒”的打字声。“彼时,她高耸的鼻梁,淡黄短短的卷发,瘦高俯身的侧影映在古色古香的窗棂上。”这套二进四合院位于东城区的八宝坑胡同里,院子幽静且宽敞,种着枣树和花椒树,从1958年到1960年,杨宪益和夫人子女在那儿愉快地住了3年。表妹杨焱(杨宪益二女儿)回忆称,小时候居住过的八宝坑胡同,是她住过最好的地方。

许是因为童年的遗憾和对那段短暂美好日子的追忆,杨焱在母亲去世后买下了小金丝胡同的六号院,并进行改造翻盖,接来了独居一年的父亲,开始了三世同堂的生活。杨宪益曾赋诗记此事:“独身宛转随娇女,伤偶飘零似断蓬。莫道巷深难觅迹,人间何处不相逢。”而杨宪益最后十年时光的记述,也多发生小金丝胡同的六号院里。

高朋满座:杨宪益的“名家”朋友圈

翻开《我的舅舅杨宪益》附录4“人物介绍”,从国际记者爱泼斯坦、英籍学者白霞,到现代文学家巴金、胡适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钱锺书、杨绛、萧乾、夏衍,当代作家魏巍、王蒙、严文井,以及数学家华罗庚、画家蔡若虹、漫画家丁聪、版画家黄永玉、艺术家韩美林、翻译家董乐山、散文家冯亦代、历史学家顾颉刚、南开校长张伯苓、表演艺术家黄宗江、收藏家王世襄、导演谢晋……遍及现代文坛、艺术圈、出版界的名家百余人赫然在目。这是杨宪益的朋友圈,用时髦的话来说,属于毋庸置疑的“顶流”。

因为“翻译了整个中国”,杨宪益将百余种中国文学名著译成英文,让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,与中国现当代文坛、艺术界的关系源远流长,他也与中国文学圈里的作家、翻译家、艺术家等

回首杨宪益的居住史,就是一部半生漂泊史。早年他是天津中国银行行长家的独子,花园洋房,富足安乐。19岁时,他留学英国,住在伦敦的小洋楼里;6年后,他带着英国未婚妻戴乃迭从伦敦回到重庆,家族已经败落,全家租住在小龙坎“丁家花园”。一年之后又和妻子到贵阳工作。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战火纷飞,政局动荡,杨宪益在四川、贵州和南京等地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岁月,在很多地方客居过。1952年,杨宪益应邀北上,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,在搬离八宝坑胡同的独栋四合院后,他和妻子回到百万庄的外文局宿舍楼,在那里一住就是40年。

1968年4月的一个夜晚,夫妻俩分别被投入监狱,四年后又前后归来,屋子里还摆着入狱前喝剩下的半瓶白酒,颜色已变黄。长子去世后,戴乃迭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整个人也变得沉默寡言,杨宪益寸步不离地守着深受打击的

成为朋友。在赵蘅记忆中,上世纪80年代开始,舅舅家常常高朋满座,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坛名家、艺术大家都是杨宪益的“座上客”。“那时候客人太多了,老朋友、年轻朋友,中国人外国人都有,很多作家都是常客,很多人慕名而来。”

在赵蘅笔下,杨宪益与这些名家的交往质朴、平易,既有高知家庭的儒雅温婉,又有着浓浓的烟火气。赵蘅写道:“不一会儿黄宗江来了……老人们有的坐,有的站,喝过酒的一个个成了红脸关公。我和认识的——打了招呼。邵燕祥老师隔着餐桌向我作揖。丁聪从卫生间出来和我握手,他的头发依然黑色,但人变瘦了。好几位是生面孔,据说其中有夏衍的公子,也六十多岁了……”赵蘅记起有张照片,有一次舅舅刚从日本回来,因学了茶道,在一次聚会上跪在地上,结果大家乐不可支

妻子。1989年,戴乃迭病情加重,被诊断疑似老年痴呆症,开始失忆。1995年,他与妻子被安排在了友谊宾馆的颐园,安娜·路易丝·斯特朗、马海德、史沫特莱都曾是他们的邻居。1999年11月,戴乃迭去世,杨宪益表示:“乃迭不在了,我不能再住在宾馆里,这是她的待遇。”

从2000年到2009年,杨宪益在亲人的陪伴下,平静、安详地度过了晚年。他先是搬到了五路居的美丽园,并在这里写下了那首悼念亡妻的诗:“早期比翼赴幽冥,不料中途失健翎。结发糟糠贫贱惯,陷身囹圄死生轻。青春作伴多成鬼,白首同归我负卿。天若有情天亦老,从来银汉隔双星。”

杨宪益为人清高,与世无争,与妻子质朴从简了一辈子。大女儿杨焱说过,和父亲提到过好多次申请大房子的事,他都满不在乎。在赵蘅印象中,晚年的舅舅每天过着简单的日子,一件毛衣穿多年,从不注重生活享受。

笑成一团,非常轻松的氛围,“那时候改革开放了,大家都感觉到中国有希望了。”

住小金丝胡同的时候,与舅舅来往比较多的是丁聪、沈峻夫妇,黄苗子、郁风夫妇等老朋友。“他这辈子认识人太多,好多都是我带去的。”赵蘅多年来和这些名家接触、交往,常常是这些客人的“车夫”,负责“迎来送往”。赵蘅印象深刻的是巫宁坤从国外回来后来看望舅舅,“他跟我舅舅坐在沙发上一起拍照,舅舅说乃迭要是在就好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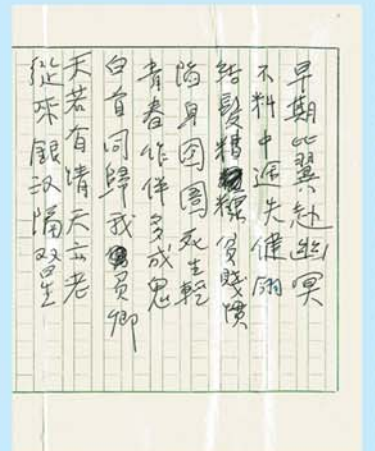
赵蘅以画家特有的眼睛呈现了舅舅晚年众多光影流动的生活场景。在她笔下,在小金丝胡同的日子里,舅舅经常坐在沙发的老位置上,满头银发冲着她。家庭聚会、朋友来访,文化交流……从这些生活场景和原汁原味的对话中,杨宪益的形象具象而亲切。



杨宪益在英国留学,1934年。



杨宪益戴乃迭结婚照,1941年。



杨宪益悼念亡妻手稿。

品行高洁:一种强大富足的精神力量

《我的舅舅杨宪益》一书是杨宪益晚年生活的最真实写照。其中包含了他与子女的沟通相处、读书、写作、会友、抗癌、治疗、与家人的团聚等场景,直白又亲切,平淡却细腻,杨宪益的个人形象在赵蘅笔下栩栩如生。他是位脾气好、极有教养、品行高洁的老人,半生的动荡、劫难,丧子、丧妻的痛楚并没有磨平他的风骨。诚如赵蘅所说,他伟大而纯粹的人格、不同凡响的思想,透过这些充满温度的细腻文字感染人心,给予我们一种强大而富足的精神力量。“舅舅是大师,让我高山仰止,只有敬佩。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有这样了不起的知识分子,我感觉很骄傲。”赵蘅表示。

赵蘅在书中写道:“世界上好像只有两个人在他们的最后时候不觉得欠自己什么了,一个是梵高,另一个是我的舅舅……舅舅年轻时代的坚实底子使他一生成就丰厚,单看李岫所罗列的译著目录就令人瞠目结舌。他的晚年是潇洒地看着他辛勤培育过的孩子一个个回来,重印、再版,丛书、系列源源不断。他不再遗憾什么了,乃迭在天国等他团聚,他

暂留在大家身边也好,他都不在乎。舅舅是世界上活得最轻松的人!”

杨宪益的代表作数《祝酒辞》:“常言舍命陪君子,莫道轻生不丈夫。值此良宵须尽醉,世间难得是糊涂。”他真诚坦荡,大度随和,无论是社会名流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辈,他都欢迎来访,大方地送出自己的书籍和藏品。他公正,待人接物彬彬有礼,一视同仁,是保姆遇到过的“最客气的老人”,无论为他做什么都会说声谢谢。“舅舅对所有人,不管高低贵贱,都是一样的态度。朋友们都愿意看他,哪怕不说话,和他相处非常舒服,不愿意离开。”这样一位诗酒风流的名士,一位潇洒达观的真公子,在经历了富贵浮沉、大起大落后,依然保持着那份平和与淡然。

赵蘅表示,舅舅的宽容、平和、慷慨、乐于助人、特别谦和让她印象深刻。在舅舅而言,是品性的自然流淌,对后辈是一种自然传承,在赵蘅而言,她从中受益并受教,会有意识地传递给后辈。

赵蘅从南京考到中央美院附中的

时候,舅舅亲自发了电报,告知被录取。“那时候电报是很珍贵的。”考试期间赵蘅住在舅舅家。有一次创作课她没画好,觉得考不取自己很难过,结果不小心迷路了,那是1960年,在夜里11点才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舅舅家。妈妈又着急又生气,舅舅劝慰她说:“孩子回来了,不要再责怪她。”

杨宪益对后辈特别爱护和宽容。赵蘅上世纪90年代到欧洲去,舅舅拿出8000港币送她。赵蘅写作之后,舅舅经常帮她校对稿子,鼓励她,帮她出主意,帮她想书名。舅舅期待她能在文学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。在赵蘅的娓娓诉说中,很多日常的琐事,点点滴滴可见杨宪益的性情和对她的关爱。赵蘅提到婚变的时候,舅舅对她的关切,“他自己担心很久,但是不说出来,微醉的时候直接问了,让我很震动。我出国他拿钱给我可能也是考虑到我一个人。”赵蘅还记得有次生病了,姨妈托保姆送了鸡汤来,有个小便条“代表舅舅舅妈姨妈姨夫的爱”,她知道舅舅不说,但这里也有舅舅的爱。



左起赵蘅、杨焱、赵苡、杨焯,1950年。



赵蘅速写,《我的舅舅杨宪益》插图。